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Title	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神戸台灣同鄉會」的去殖民化之路：在「去政治化」與「被污名化」之間
Author(s)	岡野, 翔太
Citation	台灣史學雜誌. 2020, 29, p. 55-89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83312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神戶台灣同鄉會」的去殖民化之路——在「去政治化」與「被污名化」之間*

岡野翔太（葉翔太）／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研究科特任研究員

摘要

在日台灣人的居留權利、台籍日本兵的賠償，以及戰死者的追悼等歷史遺緒，這些都是戰後東亞新秩序形成後被忽視的問題。1960年代，神戶台灣同鄉會欲擺脫「兩個中國」政治性束縛，嘗試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因而採取「去政治化」的策略與行動。該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傷殘的台籍日本兵及戰死者家屬的補償，以及保障在日台灣人居留的權利等，都提出明確的主張，這些都是日本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不願意面對的議題。

神戶台灣同鄉會以「無黨、無派、無政治思想」的「三無主義」為基礎，試圖團結在日台灣人，向日本政府陳情改善在日居留資格。然而，此會幹部多半參與廖文毅所領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將其視為「顯係偽台獨

* 本文初稿曾於2019年9月5日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雷震研究中心、雷震紀念館主辦之「國際青年學者工作坊：2019自由、民主、人權與近代東亞」發表一部分，感謝評論人鶴園裕基老師指教。其後，復於2019年9月6日「第11屆台日國際研討會——近現代東亞跨界活動與社會變遷」發表，感謝會中評論人許瓊丰老師及與會學者何義麟老師指正。也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以及蘇瑞鏘老師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同時也感謝大阪大學林初梅老師、國史館協修葉亭葶學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張瑜庭老師、政大台史所碩士莊宏年先生不厭其煩幫我潤稿。另外，也感謝大阪大學博士生吳穎濤同學、大阪大學碩士生胡怡然同學幫我修改中文，特此致謝。

份子假藉名義」展開活動的一群人。由於神戶台灣同鄉會領導者的意圖，一開始就「被污名化」，因而其努力仍是徒勞無功， 在1970年代初即黯然消失。

關鍵詞：在日台灣人、台籍日本兵、去殖民化、神戶台灣同鄉會、華僑

一、前言

1960年代在日台灣人[1]組成了「神戶台灣同鄉會」，此會欲擺脫「兩個中國」政治性束縛，試圖走出自己一條路，故採取「非政治」盤算、主張與行動，嘗試向日本政府爭取台籍日本兵之補償與在日居留等的權利，這些都是被日本政府漠視的問題。該會雖已解散，且成立過程與活動內容很少人了解，甚至曾遭到中華民國政府[2]打壓，但其組織成立過程及其主張，依然深具研究價值。

神戶台灣同鄉會中，有兩位關鍵人物。一個是黃介一，另外一個是黃龍雄。他們都是廖文毅領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下稱：臨時政府）成員。臨時政府在舉辦台籍戰死者追悼儀式及保障在日台灣人居留問題等議題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然而，目前學界在探討戰後在日台灣人時，多將焦點置於其政治意識或認同[3]。例如，許瓊丰、[4]陳慶立、[5]郭鋭[6]等人對臨時政府，都是將該團體視為在日台獨運動的一環進行研究。此外，也有學者發表黃昭堂、許世楷等人的口述記錄[7]，王育德、史明等人亦有回憶錄出版。[8]也就是說，迄今為止的在日台灣人研究，其

1 在日台灣人大致可以分爲，戰前來自殖民地台灣並且戰後好持續居留日本的台灣人及其子孫與戰後移住者。這些人都是本文討論的範圍。

2 在本文研究時間斷代中指稱的「中華民國政府」，其運作是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因此，本文所稱「中華民國政府」，實際上指涉的對象包含中國國民黨與政府兩個體系。

3 許瓊丰，〈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課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兵庫縣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9年）。陳來幸；許瓊丰譯，〈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重建與結構變化——台灣人的擡頭與錯綜複雜的東亞政治歸屬意識〉，《台灣風物》63：1（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2013年3月），頁135-162。陳來幸著，〈在日台湾人と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左傾化現象〉，收錄於陳來幸・北波道子・岡野翔太編，《交錯する台湾認識——見え隠れする「国家」と「人びと」》，（東京：勉誠出版，2016年），頁165-180。何義麟，《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15年）。

4 許瓊丰，〈戰後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廖文毅及其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為中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年）。

5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年）。

6 郭鋭，〈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独立運動に関する研究〉，（神戸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18年）。

7 黃昭堂口述；張炎憲、陳美蓉採訪整理，《建國舵手黃昭堂》，（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2年）。張炎憲、陳美蓉主編，《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2年）。

8 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集協力，《「昭和」を生きた台湾青年:日本に亡命した台湾独立運動者の

中包括臨時政府研究，多注重1965年廖文毅返台之前的獨立運動，該集團對在日台灣人居留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及其對應之道等，並未有相關研究成果產生。

本文將利用《外交部檔案》、《台灣民報》、《台灣公論》、《月刊台灣協會報》、《華僑報》等資料，爬梳台籍戰歿者追悼儀式的實施與神戶台灣同鄉會的成立經過，嘗試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情勢的轉變對在日台灣人產生何種衝擊？以及在日台灣人如何因應等問題。具體而言，本文將以黃介一及黃龍雄所參與的「神戶台灣同鄉會」為中心，觀察中華民國政府眼中該會成員的政治傾向，說明此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定位，同時探討戰後在日台灣人如何尋求去殖民化之路。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共分四節探討。第二節將探討台籍戰死者追悼儀式的歷史背景，以及黃介一的生平事蹟。第三節將考察黃龍雄在神戶成立的「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與「台灣鄉友連合會」之關係，並檢視兩會强調「非政治」的條件，以上為神戶台灣同鄉會成立的前史。第四節將討論神戶台灣同鄉會組織的發展，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看待同鄉會的政治性問題。第五節將透過東京「台灣人權利擁護總聯合會」的成立及其與「神戶台灣同鄉會」之關係，說明聯合會及同鄉會如何標榜組織與活動的「非政治」性，試圖避開中華民國政府的干擾、爭取傷殘或戰死的台籍日本兵之補償，以及保障在日台灣人居留等權利的摸索過程。

二、台籍戰死者追悼儀式的前史

（一）戰後東亞情勢驟變對在日台灣人的衝擊

台灣人移居神戶的歷史悠久，1896年日本當局即開設了基隆神戶之間的內台航線，[9]1907年台灣經商者已陸續移居到神戶。[10]1948年，居住在

回想1924→1949》、（東京、草思社，2011年）。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台北：前衛出版社，2016年）。

9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逓信部，《台灣の海運》（台北：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逓信部，1935年），頁3。

10 松井明太，〈神戸と台湾出身華僑〉，《神戸と華僑》（神戸：甲南大學綜合研究所，1993

神戶的台灣人已有3,149人，比在此的中國人略多。[11]以長期居留在日本各城市的台灣人而言，在神戶的人數僅次於東京。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全面撤退到台灣，加上1952年日本主權的恢復等，整個東亞的政治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日本帝國的瓦解和「兩個中國」局勢的形成，戰前赴日本經商或留學的台灣人，因所屬國家發生了變化，必須盡力去適應新的國家身分。然而，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並非從戰前便生活於日本的台灣人都能接受，其中部分人士對於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相當不滿，有些甚至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希望。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建交，雙方簽訂《中日和平條約》（日方稱：日華和平條約）。同一天《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政府宣佈台灣人及朝鮮人等舊殖民地出生者喪失日本國籍，並公佈第126號法律（下稱：法126號），處理戰前來自殖民地的台灣人及朝鮮人之日本居留問題。然而法126號竟沒有規定在留資格與在留期限，使得適用法126號的在日台灣人與朝鮮人及其子孫的法律地位未能獲得應有的保障。[12]

因國籍變更的緣故，戰時受傷的台籍日本軍人與軍屬[13]（以下統稱台籍日本兵）以及戰死者的家屬，未能從日本政府處得到任何補償，甚至完全被置之不理。1952年，日本政府雖制定〈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下稱：〈援護法〉），開始對傷殘軍人與其遺族進行補償，台灣人與朝鮮人卻因被歸類為外國人而被排除在外。除了補償問題，不論是在日本還是在台灣，日本政府都沒有為被盟軍轟炸而死的台灣人或戰死的台籍

年），頁53。

11 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阪中華会館の百年 改訂版》（東京：研文出版，2013年），頁413-414。

12 關於這一點何義麟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請參閱：何義麟，〈戦後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の変遷:永住権取得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現代台湾研究》第45號（大阪：台灣史研究會，2014年11月），頁1-17。何義麟，《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15年）。何義麟，〈戰後在日台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收錄於許雪姬編《來去台灣——台灣史論叢 移民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年），頁273-296。

13 台灣人青年被徵召成為日本軍，在當時雖被稱作「自願參加」，但根據本人的說法是接近「強制徵召」狀態。另外根據小野純子的訪談調查，「『自願』之定義應係指受到徵召亦不會感到不滿之狀況。小野純子〈太平洋戦争期、台湾人徴集兵における戦争体験〉《人間文化研究》22（名古屋），（2014年12月），頁66-67。

日本兵舉辦任何的官方追悼儀式，甚至沒有設置任何紀念碑（日文原文：慰靈碑）供後人緬懷。因此，對在日台灣人而言，除了爭取補償，追悼二戰期間戰亡的台籍日本兵也是關切的問題。

（二）黃介一與戰後在神戶的台灣獨立運動

大約同一時間，一些因二二八事件被迫逃亡的台灣人也來到了日本，其中，廖文毅、王育德、史明以及黃介一等人都積極開展台獨運動。雖然他們主要的活動據點在東京，但神戶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據點。

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身處上海，因批評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而遭通緝。1950年經香港偷渡到日本，開始領導台獨運動。1955年9月1日，廖文毅在東京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宣布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於次年2月28日就任「大統領」（總統）。1953年在東京首次出版臨時政府的機關報《台灣民報》，這是了解臨時政府動向的主要資訊來源（參見表一）。

表一　1950-65年間與臨時政府相關的台獨團體

團體名稱	成立年月	所在地	代表人物
台灣民主獨立黨	1950年5月	東京	廖文毅、吳振南、郭泰成、簡文介
台灣獨立聯盟	1955年2月	東京	黃南鵬
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會議	1955年9月	東京	臨時國民會議：吳振南 共和國臨時國民會議：郭泰成、吳振南、 張春興、黃介一、廖敏耀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1956年2月	東京	廖文毅、郭泰成、林台元
台灣獨立統一戰綫	1960年1月	橫濱	廖文毅、張春興、吳振南、童一中、王育德、簡文介、劉吶明
台灣自由獨立黨	1961年2月	大阪	張春興、廖敏耀、曾源興、黃振民、廖德隆、郭幸裕、陳金泉、李進通、陳維烱、詹東光、李禮謙
台灣新聞社	1961年7月	東京	林台元
羊之會	1961年10月	東京	林台元
台灣建國會	1961年	東京	林台元

團體名稱	成立年月	所在地	代表人物
台灣新聞協會	1961年10月	東京	黃介一
台灣公會	1962年	神戶	黃介一、林清廉、史明
台灣獨立同志社	1963年3月	東京	邱永漢、林炎星
台灣獨立革命評議會	1963年4月	名古屋	吳振南
台興會	1964年7月	東京	張春興
台灣獨立促進軍事委員會		-	黃介一

資料來源：許瓊丰，〈戰後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廖文毅及其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為中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頁7 。

接著，臨時政府為團結在日台灣人又欲成立「台僑總會」，其主要背景是基於「在日台灣人」已經被「華僑」一詞所包含，因此有「應該明確區分他們和華僑」的想法。[14]但這並不代表要參與台僑總會的人與其他「華僑」相互對抗，而是為了向這些人傳播獨立運動思想，鼓勵他們加入台獨陣營，[15]其活動範圍逐漸擴展到橫濱、名古屋、大阪和神戶等地。神戶是僅次於東京的第二大活動基地，而黃介一在臨時政府的活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黃介一（1917-2007），生於台北，[16]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爆發逃離台灣。戰後台灣政局混亂，不少台灣人偷渡逃往日本，黃介一在同年8月也從蘇澳港搭漁船出海，於和歌山著陸。[17]而後他在神戶經營台灣料理店「かっぱ天国」（河童天國）賣餃子謀生，沒多久便投身台灣獨立運動，於1956年當選「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會議」議員，並於1959年成立台灣公論社、發行《台灣公論》，[18]1963年到1965年間更擔任了「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會議」議長一職。[19]

14〈“台僑總会”“愛國青年団”の設置 簡内務省長内政治方針を語る〉，《台湾民報》第28號，1956年1月28日，第2版。

15 陳太平，〈台湾独立統一戦線について 童一中氏に聞く〉，《台湾公論》第2號，1959年，頁25。

16 許瓊丰，〈戰後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廖文毅及其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為中心〉，頁11。

17「海一（57）字第11833號」（民國57年11月17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3。

18 許瓊丰，《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課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頁203-204。

19〈臨時政府の改組と国民議会新発足 議長に黄介一氏名を選出〉，《台湾民報》第124號，1963年6月28日，第1版。

黃介一和臨時政府不僅在日展開台獨運動，還積極處理一些被日本政府所「遺忘」的問題。例如，戰前台灣人屬日本帝國的臣民，許多台灣人為日本戰死，但在帝國瓦解後，日本政府卻未舉行任何的追悼儀式；而戰後台灣因被中華民國政府接管，更無可能為了曾經是「敵人」的戰死台灣人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在這樣的脈絡下，兩國政府皆未舉行戰死台灣人的紀念活動，因此黃介一與臨時政府便積極舉行「台灣人戰歿者追悼儀式」。

1960年3月20日，黃介一在京都的「靈山觀音」參加26名被處死的台灣戰犯的追悼儀式。[20]靈山觀音是企業家石川博資為了追悼二戰期間的戰死者，於1955年在京都的東山區所建立的觀音像及寺廟建築。1957年，日本文化聯合會的小見山登在此建立「韓國人犧牲者慰靈塔」，紀念在朝鮮半島出生但二戰期間被處死的戰犯。據橘尚彥的研究，1960年3月20日在京都靈山觀音所舉辦的「韓國北朝鮮台灣出身戰犯刑死者法要」活動，即為26名被處死刑的台灣戰犯的追悼儀式，小見山登等人亦前往參加。[21]

黃介一在追悼式中宣讀追悼文，表示 ：「我將以我的無私奉獻為榜樣，發揚其精神，為實現台灣的獨立而盡力」。[22]另外根據《台灣民報》1961年4月28日的報導，此年3月22日廖文毅亦在京都靈山觀音主持了「大東亞戰爭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23]臨時政府為了達成台灣獨立的目標，透過演講、座談會等方式爭取各界的支持。此外，臨時政府早已在東京舉辦過二二八事件紀念會，對於臨時政府在東京的活動已有陳慶立等許多先行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贅述。[24]

目前由於資料不足，筆者無法得知1962年至1963年間的有無相關活動，但1964年3月1日廖文毅曾在京都靈山觀音舉行「慰靈祭」，但更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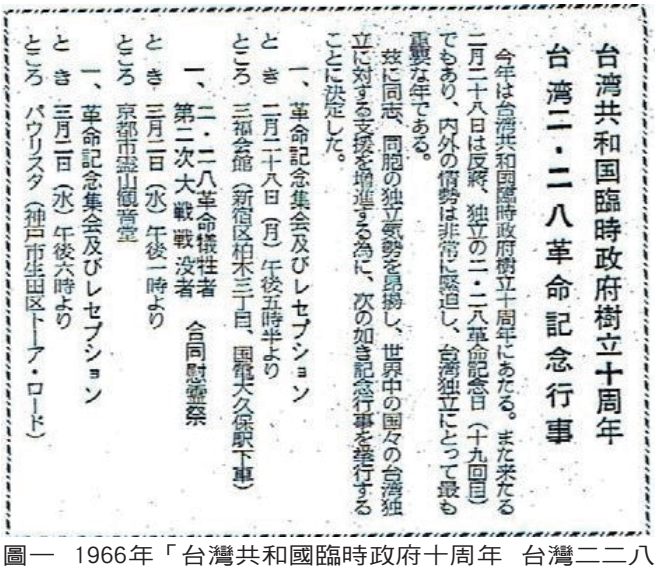
20 許瓊丰，《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課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頁209。

21 橘尚彥，〈京都忠霊塔と霊山観音——東山・霊山山麓における戦死者祭祀をめぐって〉《京都民俗》28（京都），（2011年3月），頁163。

22〈国境を越えて慰霊祭 霊前を飾る祖国の供物 台湾戦犯刑死者廿六名とむらう〉，《台湾公論》第6號，1963年7月，頁27。

23〈合同慰霊祭、厳かに挙行　大東亜戦争台湾人戦没者〉，《台湾民報》第81號，1961年4月28日，第1版。

24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頁236-237。


台湾共和国臨時政府樹立十周年
台湾二・二八革命記念行事

今年は台湾共和国臨時政府樹立十周年にあたる。また来たる二月二十八日は反終、独立の二・二八革命記念日（十九回目）でもあり、内外の情勢は非常に緊迫し、台湾独立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年である。

茲に同志、同胞の独立気勢を昂揚し、世界中の国々の台湾独立に対する支援を増進する為に、次の如き記念行事を挙行することに決定した。

一、革命記念集会及びレセプション
とき　二月二十八日（月）午後五時半より
ところ　三福会館（新宿区柏木三丁目、国電大久保駅下車）

一、二・二八革命犠牲者
第二次大戦戦没者　合同慰霊祭
とき　三月一日（水）午後一時より
ところ　京都市霊山観音堂

一、革命記念集会及びレセプション
とき　三月一日（水）午後六時より
ところ　パウリスタ（神戸市生田区トーア・ロード）

圖一　1966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十周年　台灣二二八革命紀念活動」廣告。
資料來源：《台灣民報》（東京），1966年2月1日，第158號。

「大東亞戰爭台灣人戰歿・刑死者及二二八革命先烈合同慰靈祭」，聲稱有400餘人參加，當中有廖文毅、黃新興（台灣鄉友會）、黃介一、石津經秀（鄉友會青年部部長）、松本明重（日本民主同志會中央委員長）、藤澤繁三（原日本陸軍中將）、植木光教（參議院議員）等人。[25]

次年（1965年3月1日）廖文毅也在京都主持了「慰靈祭」，出席者有廖文毅、廖明耀、郭泰成、黃介一、林清廉、童太明、林炎星、陳維烱、楊正人等台灣人，以及神戶大學助教授黑岩一郎與大井清等6名日本人。[26]中華民國駐大阪總領事館（下稱：駐大阪總領事館）曾針對此次「慰靈祭」的活動向駐日大使館、外交部以及國民黨第三組提出報告。

從以上資料可知，京都「慰靈祭」的首次發起人是小見山登，其後才由廖文毅一派接手作為工具性的政治訴求，致使京都「慰靈祭」成為每年必有之儀式。1965年5月15日，廖文毅宣布放棄台獨運動返台，與臨時政府有關之台獨團體亦出現鬆動現象。[27]其後，郭泰成（任期：1965-

25〈大東亜戦戦没・刑死者　台湾二・二八革命先烈　京都で合同慰霊祭〉，《台湾民報》第132・133號，1964年4月28日，第3版。

26「阪（54）字第0624號」，（1965年3月3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

27 例如：「台灣民政黨」的鄭萬福及「自由獨立黨」的曾源興等人聲明脫離獨立運動。〈「台湾民政党」を解散 蔣総統指導下反共に徹る 鄭萬福氏が声明を発表す〉、〈「台湾独立運動」関係を絶つ 自由独立党組織部長曽源興が声明〉，《自由新聞》第248號，1965年6月1日，第1

1976）、林台元（任期：1976-1977）繼任了臨時政府的「大統領」，但也持續在京都靈山觀音舉辦慰靈祭。如《台灣民報》於1966年2月公佈，將於同年3月2日舉行「二二八革命犧牲者・第二次大戰戰歿者合同慰靈祭」一事（圖一）。衆所周知，臨時政府的勢力日益衰微，最終在1977年落幕。林清廉在口述記錄中回憶，京都「慰靈祭」後來改由黃介一的台灣公論社主辦，至1980年代初期為止仍以「台灣獨立二・二八殉死者・大東亞戰爭台灣人戰犯刑死者合同慰靈祭」之名義持續舉辦。[28]

三、在神戶的台籍戰死者追悼儀式

（一）從京都到神戶

關於戰後補償問題與戰死者追悼活動之關聯性，日本近現代史學家赤澤史朗認為，應將「對包含遺族的生者進行物質上的補償」以及「對戰死者的慰靈追悼」兩件事等同看待，若「無法予以犧牲者物質上的補償，則應以『慰靈』等追悼活動取代」。[29]然而，台灣人並沒有獲得上述任何物質上的補償。因此，黃介一及廖文毅等在舊宗主國日本積極替「為皇國所犧牲」的台灣人發聲。

早先因京都有舉辦「大東亞戰爭台灣人戰歿・刑死者及二二八革命先烈合同慰靈祭」，日後逐漸發酵，在神戶也出現類似的活動。1965年9月，潘耀石、黃仁傳、黃龍雄、大井清發起了「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會址就設於神戶市，此一舉動也引起了國民黨的關注。國民黨駐神戶直屬支部（下稱：國民黨神戶支部）向黨中央報告：「此實行委員會中有黃介一等台獨份子」。[30]另外，委員當中有位黃龍雄（又

版。此外。根據陳慶立的著述，「台灣民政黨」當時為中華民國政府調查局所控制。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頁84。

28〈林清廉氏〉，收於神阪京華僑口述記録研究會《聞き書き・関西華僑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3（神戶：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2010年12月），頁141、150。

29 赤澤史朗，〈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戦没者の「慰霊」と追悼〉《立命館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82（京都），（2014年12月），頁121。

30「偽台獨黨本年三月二日神戶集會名單」（1965年3月6日），《偽台獨份子在日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28。

名黃新興），[31]1956年他就任「臨時政府」財政理事會理事，[32]1963年以台灣自由獨立黨的黨員身分在國民議會擔任議員。黃龍雄原為日本軍屬，因戰後喪失日本國籍，所以當日本政府給予軍屬補償時，他並不在名單之列。1964年，他與其他在日本的原台籍日本軍屬們在神戶組織了「台灣鄉友連合會」，要求日本政府正視該議題。[33]同年3月，他以台灣鄉友連合會成員身份前往京都參加「慰靈祭」。

（二）成立動機與原因

《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趣意書》（下稱：《趣意書》）中寫到，「台灣人當年不僅是日本帝國臣民，帝國軍人軍屬更是以產業戰士之姿，奉公無私地做出貢獻，並進而化作護國之鬼」、「曾經的祖國日本對這樣的台灣人不聞不問」，「戰後20年的今天，我們集結『戰友、朋友有志一同』祭祀戰歿者、宣布發起慰靈活動」。此外在《趣意書》中也提到，預計在2年後建造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塔，在此之後策畫組織日本各地的慰靈祭實行委員會支部。[34]

黃龍雄於1963年組織了「台灣鄉友連合會」，並擔任會長一職。該會規定會員應是台灣出身，且原為日本軍人和軍屬、或戰時自動歸屬為軍隊船員、或高座海軍工廠的少年軍屬。至於組織台灣鄉友連合會之理由，黃龍雄在訪談中直言道：

> 之前就覺得需要籌組此會。尤其是，去年（筆者注：1963年）我透過電視看到戰後第一次由日本政府舉辦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式」時，覺得我們也曾經是日本的國民。過去為了日本同胞，我們把寶貴的生命奉獻給日本。但，為天皇陛下效忠的台灣人，他們的國籍受到日本單方面的剝奪。另一方

31「偽台獨黨本年三月二日神戶集會名單」（1965年3月6日），《偽台獨份子在日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28。

32 郭銳，〈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独立運動に関する研究〉，頁60。

33 黃龍雄訪談，〈蔣強盜　台湾英霊の骨までしゃぶる　台湾郷友連訪問記〉，《台湾民報》第143號，1964年12月1日，第3版。

34「偽台獨黨本年三月二日神戶集會名單」（1965年3月6日），《偽台獨份子在日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28。

面，因為台灣人非日本國籍，因此得不到犧牲者應有的補償金以及年金。就只有台灣的戰死者遭遇如此悲戚的命運，我們是不是乾脆直接放棄然後像螻蟻一般地死去更好？[35]

黃龍雄的第一步是1965年11月27日在神戶舉辦第一屆「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36]參加者有郭泰成、林台元、陳維烱、廖明耀、詹東光、黃介一、林耀南，以及兵庫縣知事、前日本海軍中將草鹿龍之介等人，[37]該年正好是神戶台灣同鄉會成立的同一年。舉辦第一屆神戶「慰靈祭」典的9日前（11月18日），黃介一在神戶台灣同鄉會上呼籲大家出席該慰靈祭，然有部分人士卻在駐大阪總領事館以及國民黨駐神戶支部的勸說之下缺席慰靈祭典，慰靈祭當天的出席者共65名，其中「台籍者僅廿名左右」。[38]不僅如此，「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發起人之一的黃仁傳，於1965年11月11日在有國民黨背景的《自由新聞》上刊登「聲明書」，向外宣稱「本人未同意」加入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39]

約同一時間，「元日本軍台灣人戰傷者會」（以下稱為傷殘軍人會）會長黃瑞來利用1964年舉辦的東京奧運，在國立競技會場前向日本政府陳情並要求補償軍屬。此外，第三屆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於1967年11月11日在神戶舉行時，黃瑞來亦以傷殘軍人會會長身份參加。[40]

黃瑞來在1943年2月因軍事動員而成為日本兵，從高雄被派遣至緬甸，戰爭期間負傷，終戰後被送往日本第三陸軍醫院治療，1946年7月出院並且在日本待了下來。[41]然而，他因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而喪失日本國籍，無法成為〈援護法〉的補償對象。黃瑞來曾多次前往厚生省及區公所

35 原文日文，筆者譯。黃龍雄訪談，〈蒋強盗　台湾英霊の骨までしゃぶる　台湾郷友連訪問記〉，《台湾民報》第143號。

36「台湾人戦没者合同慰霊祭典実行委員会趣意書」（1965年9月），《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37〈台湾人戦没者慰霊祭　神戸で厳粛に挙行〉，《台湾民報》第156號，1965年12月1日，第4版。

38「海一（54）字第11719號」（1965年12月18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39〈声明書〉，《自由新聞》第256號，1965年11月1日。

40〈台湾人戦友よ安らかに 神戸でも合同慰霊祭 涙で弔ったその日の感銘〉，《台灣協會報》第159號，1967年12月15日，第2版。

41 黃瑞來，〈台灣人戰爭犧牲者悲憤的呼喚〉《台灣青年》第77號，1967年4月25日，頁3。

申請補償，但都未被受理。1962年黃瑞來以「傷殘軍人會」會長的身分欲與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交涉相關補償問題，也都遭到拒絕。黃瑞來更率領「傷殘軍人會」於1964年東京奧運會場進行抗議活動，其後更遭到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館員斥罵：「你們是日本軍人，去向日本政府講吧！現在祖國正在戰時體制下，不能把你們這些漢奸當人看！」。[42]

對於戰死者家屬的處境，黃龍雄也訪談中說：「國民政府對於戰死台灣人的遺族如此冷漠，根本就是『跟著日本軍一起將槍口對著我們的無良之人』。」此時中華民國政府雖曾為解決台籍日本兵補償的問題而向日本政府交涉，但從黃龍雄角度來看，這「不過是（筆者註：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手段之一」，其中更強調「補償金的交涉是當事者的台灣人與日本政府間的問題，也是本會（按：台灣鄉友連合會）宗旨及責任」。[43]

（三）「非政治」的盤算

黃龍雄曾被問到「台灣人之獨立問題」，或許意識到自己是以台灣鄉友連合會會長之身份受訪，他直言：「因本會非政治團體，故我保留對此事的看法」。[44]由此可知，「台灣鄉友連合會」採取了不涉及「政治」的態度，但也因他們刻意與台灣獨立團體以及國民黨保持距離，本身就顯現出「政治性」。總而言之，在日台灣人只要涉及到關於自己的歷史一事，就意味著他們只能被困在「兩個中國」或是戰後在日本被「外國人化」[45]的這兩個結構中，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即使在日台灣人不傾向於台灣獨立或者是國民黨任何一方，刻意保持距離也是另一種「政治性」的選擇。

然而，上述《台灣民報》記者最後追問「若不是以會長身份，而是以一個台灣人的身份，您對此（筆者註：台灣獨立）問題有什麼看法」時，黃龍雄則回答說：「身為一個台灣人，當然希望台灣獨立」。當初黃

42 黃瑞來，〈台灣人戰爭犧牲者悲憤的呼喚〉，頁5。
43〈蔣強盜·台湾英霊の骨までしゃぶる　台湾郷友連訪問記〉，《台湾民報》第143號。
44〈蔣強盜·台湾英霊の骨までしゃぶる　台湾郷友連訪問記〉，《台湾民報》第143號。
45 遠藤正敬，《戸籍と国籍の近現代史——民族・血統・日本人》，（東京：明石書店、2013年），頁231。

龍雄參加於靈山觀音舉辦的「慰靈祭」，也確實跟廖文毅等台獨人士有所往來。不過，黃龍雄應該已經開始思考去除「政治性運動」的特徵，而以一個「當事者」的身分來舉辦追悼儀式，而神戶「慰靈祭」的《趣意書》上更特別註明了此祭典「無政治性」。[46]在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之下，中華民國政府對付海外異議人士最常見的手段即是用「護照延期加簽」的准駁來要脅海外的台灣人。因此，黃龍雄特別强調「委員會之活動與政治毫無關聯」，是為了不讓參加委員會的人成為政府眼中的「黑名單」，也試圖拉攏一般的在日台灣人，集中力量為台籍日本兵、戰死者及其家屬爭取公道。

不過，這種關於「非政治」的盤算，在駐大阪總領事館眼中仍為「顯係僞台獨份子假藉名義」。例如，1965年神戶「慰靈祭」舉行前，駐大阪總領事館便通告「中華民國留日神戶華僑總會」禁止會員參加此活動。[47]另一方面，神戶「慰靈祭」的舉辦方期望在日台灣人能一同參與，但這對在日台灣人來說卻必須承擔相當大的風險。根據黃瑞來所述，華僑總會也是許多在日台灣人的聚集地，而大使館多次透過華僑總會掌握「傷殘軍人會」的會員數與組織擴展情況，[48]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政府會利用在日台灣人之間的網絡，隨時警戒海外的台灣人觸及自身統治正當性的問題。

四、「神戶台灣同鄉會」成立之衝擊

戰後許多在日台灣人對國民黨在台統治甚感不滿，導致不少台灣人主導的「華僑」組織迅速轉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另一方面，1949年底廖文毅前往日本，此後日本開始出現較具組織規模的台獨運動。1960年，王育德、黃昭堂等人也組織「台灣青年社」，並於1963年改名為「台灣青年會」。此外，前述黃龍雄的「台灣人戰歿者慰靈祭典舉行委員會」

46「阪（54）字第3639號」（1965年11月20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47「阪（54）字第3639號」（1965年11月20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48 黃瑞來，〈台灣人戰爭犧牲者悲憤的呼喚〉，頁4。

以及「台灣鄉友連合會」，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台灣獨立相關團體」（表二）。此類「台灣獨立相關團體」的要員，早期受到臨時政府領導而活躍於當地，甚至在廖文毅返台後仍持續向當地台灣人進行宣傳。

1969年4月2日，駐大阪總領事館的領務報告中指出，在日本關西地區的台獨組織主要有：一、台灣公論社的黃介一、楊正人等人，二、台灣自由獨立運動的陳維烱等人，三、台灣同鄉會的林朝偉等人，四、台灣鄉友會的黃龍雄等人。其中黃介一、黃龍雄都是「台灣共和國臨時議會」成員，如黃介一即曾任臨時政府議會議長。「台灣同鄉會」的林朝偉則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親匪份子」（按：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者）。[49]

上述「台灣同鄉會」即是「神戶台灣同鄉會」，該會有黃介一、楊正人、陳維烱、林朝偉、黃龍雄等「各派系」的台灣人加入。雖然所謂的「親匪份子」與台獨人士對於台灣的地位歸屬有不同看法，但因同樣有「在日」的處境，都認知到在日台灣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特殊性，而主張台灣人必須團結。以下先從台灣人所主導的神戶「左派（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派）華僑團體」談起，再分析神戶台灣同鄉會的成立背景、同鄉會中當地台灣人的合作、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應對等，並討論其主張、成員組成及重要活動等議題。

（一）在神戶的台灣人與「華僑」團體

表二是1967年6月駐大阪總領事館發予僑務委員會「調查對象華僑團體」的名單，[50]從此表可知，在神戶「左派華僑團體」與台獨團體的據點多在都市，上述的「台灣鄉友連合會」以及「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都歸類為「台灣獨立運動相關團體」。

被視為左派團體的「神戶華僑聯誼會」成立於1957年，該聯誼會成

49「領務報告」（1969年4月2日發文），《駐大阪總領事館僑務》，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1／0020。

50 由於文件中組織成立的年份以「昭和」標記，因此應可以推測日本調查當局所使用的名單並非完全按照中文文本進行翻譯。另外，也能看出中華民國政府在「與中共競爭」和「台灣獨立運動」的兩個面向上，致力與日本情治單位的合作。實際上也有記錄顯示，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曾接受日本公安調查局所提供的「神戶台灣同鄉會」的動向之相關情報。詳見「調查對象華僑團體現實一覽表」（1967年6月5日發文），《匪偽台獨組織一覽表》，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89005。

立後不久，「中國人紅十字團歡迎委員會」也成立了。「神戶華僑聯誼會」不僅舉辦了「兵庫縣殉難中國人慰靈祭」，更從1958年開始每年2月28日舉辦「二二八起義紀念大會」。此協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尚未建立邦交的背景下，鮮明地豎立起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而歷任會長及代理會長5人當中有4人是台灣人。[51]直到1960年代中期，在日二二八紀念活動都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系統的華僑團體以及台獨團體舉行。由此可看出，即使在日本與中華民國具有邦交關係的情況下，中華民國政府仍無法完全代表「台灣人」。

表二　1967年6月駐大阪總領事館發予僑務委員會的「調查對象華僑團體」一覽表

名　稱	住　址	負責人	備　註
左派華僑團體			
(1)華僑總會			
大阪華僑聯合會	大阪市北區中崎町	劉炳文	昭和35年1月15日設立，會員估計約50名，事務局長金翬實際責任。
神戶華僑聯誼會	神戶市生田區下山手通	陳恆華	
京都華僑聯誼會	京都市中京尾竹屋町	林伯叡	
(2)華僑學校			
神戶中華同文學校	神戶市生田區中山手通	李萬之	學生數747名
(3)青年學生團體			
大阪華僑青年會	大阪市北區中崎町	李智成	昭和38年5月18日設立會員約20名，刊物有大旗，窗風兩刊物。
大阪中華學校校友會	大阪市天王寺區小宮町	蘇建源	昭和27年設立
神戶中華青年會	神戶市生田區下山手通	何紹麟	
(4)婦人團體			
神戶華僑婦女會	神戶市生田區下山手通	黃慧兒	
(5)文化（宣傳）團體			

51 1957年成立當下會員數有54人（兵庫縣轄下的中國人總數約8527人），1971年則有147人。另外，日中建交後的1974年，則增加到了1812人。關於神戶華僑聯誼會，詳參安井三吉，〈神戶華僑聯誼会史綱（1957-1976）〉，收錄於戦後神戶華僑関係資料を読む会編，《戦後神戶華僑史の研究》，（2018年、神戶：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頁27-99。

國際新報社	大阪市北區鶴野町	社長曾森茂，編輯發行人聶毓良	昭和41年9月設立，約10名工作人員每週發行兩次，每次五千份。
中華書店大阪支店	大阪市北區鶴野町	宋悅子	昭和29年設立。
中華書店神戶分店	神戶市生田區北長狹通		
(6)經濟（職業）相關團體			
日本華僑貿易商公會	神戶市生田區下山手通	陳通	
日中友好協會大阪府聯合會	大阪市北區曾根崎	金子二郎	
日中友好協會京都府聯合會	京都市左京區川橋丸田町	末川博	
日本中國友好協會豐中支部	豐中市岡上の町	坂井雅一	
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關西本部	大阪市東區北濱	川勝傳 木村一三	
(7)同鄉親睦團體			
福建同鄉會館	神戶市生田區下山手通	林同春	
台灣獨立運動相關團體			
台灣獨立促進軍事委員會	神戶市生田區元町	黃介一	
抗敵三不運動推行委員會	神戶市生田區元町	〃	
台灣鄉友連合會	神戶市生田區北長狹通	黃龍雄	
台灣人戰歿者慰靈塔建設準備委員會	神戶市生田區下山手通	〃	
台灣公平報社	神戶市生田區元町	陳太平 楊正人	
台灣同鄉會	神戶市生田區下山手通	黃銅山 林朝偉	
台灣民報關西總支局	神戶市生田區北長狹通	黃龍雄	
台灣自由獨立黨大阪支部	大阪市阿倍野區天王寺	陳維烱	昭和36年4月設立，發行「台灣民報」月刊。

說　　明：在此省略電話號碼以及詳細地址。

資料來源：「調查對象華僑團體現實一覽表」（1967年6月5日發文），《匪偽台獨組織一覽表》，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89005。

（二）「神戶台灣同鄉會」的成立背景與發展

1965年6月，日韓建交，解決了從1952年起在日朝鮮人懸而未解的法律問題，也突顯解決在日台灣人的問題變得十分迫切。在這樣的情勢下，神戶台灣同鄉會擬定以「無黨、無派、無政治思想」的「三無主義」為基礎，用以團結在日台灣人，向日本政府陳情改善在日居留資格，而於11月18日在神戶「大神樓」成立神戶台灣同鄉會。[52]此為1946年11月「台灣省民會」與「中華民國留日神戶華僑總會」合併後，第一次在神戶出現的台灣人組織。[53]以下將根據國民黨神戶支部呈報國民黨第三組調查記錄，探討神戶台灣同鄉會人員的構成以及初期的參與者。[54]

根據國民黨神戶支部的電報，成立大會出席者共62人，其中有簡文介、[55]黃介一、詹東光、張有忠、林朝偉、陳金財、[56]范根炎[57]等人（表三）。張有忠，1915年出生於台南州斗六，1938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1942年派任大阪地方裁判所兼區裁判所判事。1945年日本戰敗後返台，被任命為台南地檢處檢察官，是唯一的台籍檢察官，二二八事件期間擔任臨時軍事法庭軍法官，巧遇湯德章事件。1964年為了子女的教育而前往日本，並加入大阪的律師公會。[58]國民黨神戶支部工作人員將他視為組

52「海一（54）字第10930號」（1965年3月3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53 關於台灣省民會等1945-46年間成立的在日台灣人組織，詳參閱拙稿〈去殖民化中在日台灣人身份定位的再建構—以日本神戶「台灣省民會」（1945-1946）為例〉，《台灣史學雜誌》24（台北，2018年6月），頁38-75。

54「海一（54）字第10930號」（1965年3月3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55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頁251。

56 陳金財，台灣彰化人，生於1924年，約1933年左右抵日。1966年5月，擔任「日本華僑貿易商公會」理事。因陳金財與「日本華僑貿易商公會」有所關聯，國民黨將其列入黑名單致長期無法返台。1997年，74歲時，終於實現歸鄉。資料來源：〈日本華僑貿易商公会会則〉，《貿易公会》（石嘉成先生所藏資料）。陳金財，〈經歷書〉，《貿易公会》（石嘉成先生所藏資料）。陳金財，〈ふるさと旅日記〉，《兵庫縣台灣同鄉會會報》第113號，1997年7月，頁7-9。

57 中華民國留日神戶華僑總會理事范根炎在事前將出席要旨通知國民黨神戶支部，且獲得該支部同意。如此可以得知中華民國政府透過與中華民國留日神戶華僑總會有關的在日台灣人，掌握同鄉會的動向。資料來源：「海一（54）字第10930號」（1965年12月4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54）二業字第02540號」，（民國54年3月2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神戶華僑総会改選 会長鄭旺氏が再任 副会長呂達民氏に〉，《自由新聞》，1965年7月11日，第2版。

58 張有忠，《私の愛する台湾と中国と日本》（東京：勁草書房、1989年）。天江喜久，〈台南の「救世主」となった「日本人」——湯德章英雄説の検証と分析〉，《日本台湾学会報》

織神戶台灣同鄉會的「主謀者」之一。[59]

同時，駐大阪總領事館也將黃介一與林朝偉視為該組織的中心人物。[60]在表二的駐大阪總領事館領務報告中可以發現，神戶台灣同鄉會是以林朝偉為中心的「台獨團體」。不過，中華民國政府以林朝偉曾加入「日本華僑貿易商公會」（表二）為由，將其視同「親匪份子」（表三）。「日本華僑貿易商公會」是1955年6月由林清木等在神戶的台灣人所成立，[61]此會以「基於愛國精神，堅持『祖國』（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日政治・貿易及政經不可割分之原則，促進中日兩國間的友好及經濟交流的發展」為宗旨。[62]

表三　1965年11月18日神戶台灣同鄉會成立大會參加人員名單

姓名	注記	姓名	注記	姓名	注記
簡文介	台獨有案份子一度代理僞大統領	黃介一	台獨有案份子前僞國會議長	詹東光	台獨份子
黃新興	台獨份子	楊正人	台獨份子	劉阿生	台獨流氓外號老鼠
蔡進海	流氓	謝正彥	經營食料品	林發	丸玉食堂店東
李春亭	四喜旅館店東	余志清	前台獨份子	蔡瑞芳	經營米粉
張有忠	律師	藏清長	肉飯	吳重民	
陳金財	匪貿易商	高勝景	大神樓夥計	吳英吉	律師張有忠事務員當日負責登記
盧金獅	運轉手事前未報備，事後提供資料	范根炎	事前報備，事後提供資料	許澤煌	蓬萊料理店東
陳阿寶	台獨分子，當日領頭唱台獨歌	王博華	台獨—親共—台獨	陳振益	流氓—親匪—台獨
蔡瑞庭	神戶華僑信用金庫職員	謝煌		李阿土	流氓
盧培元	酒吧	林朝偉	親匪份子	張振萬	真珠商
尚有三十二名不詳姓名待查					

資料來源：「海一（54）字第10930號」（1965年3月3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20，2018年7月，頁138。

59「海一（54）字第10930號」（1965年12月4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2。

60「阪（55）字第0320號」（1966年1月26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

61 許瓊丰，《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課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頁243。

62〈日本華僑貿易商公会会則〉，《貿易公会》（石嘉成先生所藏資料）。

此外，陳金財是神戶台灣同鄉會的參加者，也是「日本華僑貿易商公會」的主要成員；1965年1月神戶華僑聯誼會等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僑組織組成「神戶各界紀念第十八屆二二八起義大會準備委員會」，陳金財擔任副委員長。[63]雖然住在神戶的台灣人並沒有全員參加神戶台灣同鄉會，但從黃介一、林朝偉、陳金財等人的出席，可看出反國民黨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中華民國政府眼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台灣人與「台獨派」台灣人，欲擺脫「兩個中國」政治性束縛，試圖「團結在日本的台灣人」，故採取「三無主義」盤算、主張與行動，嘗試向日本政府爭取台籍日本兵之補償與在日居留等的權利，這些都是被日本政府以及「兩個中國」都漠視的問題。

（三）中華民國政府對「神戶台灣同鄉會」之因應

廖文毅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台獨運動，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打壓與策反的對策逐漸發揮效用下，加上一些內部因素，於是能量日益消退，終趨向瓦解。[64]然而，中華民國政府仍十分關注推動台籍戰死者追悼活動的黃龍雄以及神戶台灣同鄉會對當地台灣人的影響。中華民國政府透過情報人員的監控以掌握其活動，並制定相關的處理對策，建立起對一套因應機制。

1966年1月21日，神戶台灣同鄉會舉辦了元旦集會，出席者有黃介、林朝偉及其他75名台灣人。最初駐大阪總領事館視他們為「在僑社中無影響力之份子」，其實不然，如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校長李萬也出席了該會。1966年1月22日，駐大阪總領事館發電報給外交部表示：「本館除與神戶黨部密切配合，並指示：透過我方工作人員，促進匪偽加深撕裂，以加速該台灣同鄉會之瓦解」，並「對於參加該項集會分子中，物色一二略具聲望者，遇其申請赴台及其它事宜，不予協助」。[65]

63「（54）二業字第02540號」（民國54年3月2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

64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頁193。

65「阪（55）字第0320號」（1966年1月26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

當時持中華民國護照來日本的人，必須先向駐外使領館申請延長護照效期，否則可能會被遣返出境，而黃昭堂等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前台灣青年社）成員多屬此類。[66]不只護照延期，連返回故鄉台灣也必須申請「回台加簽」。中華民國政府透過上述策略，對海外異議人士進行施壓。[67]

（四）黃介一、史明與神戶「基層台灣人」間的人脈網絡

另一方面，對於1966年1月21日元旦集會的出席者，駐大阪總領事館認為多是「對華僑社會影響較低的人」，故對於社會而言幾乎沒有影響力。[68]表三所提到的參加者當中，謝正彥、林發、蔡瑞芳、藏清長、許澤煌是經營食堂或食品販賣業，黃介一則是在神戶經營台灣料理店。

然而，這些所謂「對華僑社會影響較低」的台灣人其實與台獨運動者的關係十分密切。舉例而言，從事台獨運動的史明，最早落脚的地方就是神戶，也因此與在神戶的「基層台灣人」結識。[69]史明曾回憶道，從1952年到1960年代，他為鋪設在台灣的地下工作網絡，必須靠在神戶「基層台灣人」的協助，[70]他在回憶錄中提到：

> 當時有個叫黃介一（後來返台投降）的人，在神戶組了「台灣公會」，邀請我擔任會長。神戶一帶有不少台灣人，多是賣鷄捲、切仔麵的基層大衆，社會背景跟東京的台灣人不一樣，我希望能夠鼓勵這些大衆回台灣做點事，就答應黃介一的請求，擔任該會會長。我每周從東京搭新幹線到神戶跟他們開會，也投注不少資金來舉辦活動。[71]

66 葉亭葶，〈從柳文卿事件探討日本政府對台獨運動者居留政策之轉變過程——兼論對在日台獨運動的影響〉，收錄於陳君愷主編《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台灣歷史學會創立2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16年）頁244。

67 陳昱齊，《中華民國政府對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之因應：以美國為中心(1956-1972)》，頁261、308。歐素瑛・林正慧・黃翔瑜訪問記錄，《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14年）。

68「阪（55）字第0188號」，（1966年1月17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

69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台北：前衛出版社，2016年），頁440、446。

70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442。

71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440、446。

從此可推測，史明曾透過在神戶開小食堂的「基層台灣人」，與在台灣的工作人員進行聯繫。神戶台灣同鄉會成立時，其中確有不少食堂經營者（表三）。然因史料不足，目前仍無法確定究竟是哪一位「基層台灣人」與史明結識。雖然在駐大阪總領事館眼中，與會的食堂經營者是「僑社中無影響力之份子」，但神戶台灣同鄉會的成立卻提供了「基層台灣人」集會活動的平台。不過，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逐步對此組織成員進行施壓，導致當地台灣人先後離去，成員日漸減少。

五、神戶台灣同鄉會與東京「台灣人權利擁護總聯合會」合作

（一）組織的擴張與台灣人權利擁護總聯合會

1965年11月18日，神戶台灣同鄉會在成立大會中，同鄉會幹部再度强調須向日本政府陳情，以改善在日居留資格。1966年12月3日，「台灣同鄉會第四次親睦會」在龍鳳餐廳舉行（見表四）。其中，楊杏庭（逸舟）[72]在致開會詞中强調「國民黨阻擾」神戶台灣同鄉會的成立一事，並抨擊領事館對於在日台灣人法律地位的解決上，「交涉力量不足」。除此之外，石藏江在會中發放以「在日台灣人法律地位探討」為題的文宣，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以下稱為台青聯）的廖春榮接著宣傳了台灣獨立運動。[73]

表四　1966年12月26日神戶台灣同鄉會第四次親睦會參加者加名單

姓名	備考	姓名	備考
黃銅山	會長、台獨份子	楊杏庭	台獨份子
林朝偉	親匪份子	黃龍雄	台獨份子

72 楊逸民（1909-1987），字杏庭，筆名「楊逸舟」。台中梧棲出身。1934年赴日，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在高師附屬小學任教。1940年赴中國，先後出任教育部專員、國立編譯館譯館、中央大學教授、浙江大學教授、內政部委員。1948年避難回台。1953年再度赴日，1954年入東京文理科學大學研究所博士班。此後即專注於台獨運動。期間與廖文毅相識，加入台灣民主獨立黨。1961年，漸感與廖文毅理念不合，遂離開台灣民主獨立黨。與此同時移居神戶，而後再度遷回東京。主要著作有：《受難者》、《台灣與蔣介石——以二二八民變為中心》。資料來源：楊逸舟（杏庭）遺稿、張良澤訳《受難者》（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李世傑《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頁247-262。

73「阪（55）字第4404號」（1966年12月6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

姓名	備考	姓名	備考
蘇清長	台獨份子	林清池	台獨份子
范滄洲	流氓	石本泰	親匪份子
盧盛塗	台獨份子	許澤煌	
高勝景	親匪份子	羅澤勳	東京
莊得淵	親匪份子（兒子在匪區）	廖春榮	東京偽台灣青年獨立聯盟
吳瀛杰	無業遊民	石藏江	東京自稱東京華僑文化協會會長
施麗源	親匪份子	林水	京都 台獨份子
沈通河			

資料來源：「阪（56）字第1333號」（1967年4月11日發文），《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1。

石藏江，1914年生於台南，1932年就讀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戰後在東京品川區荏原創立「石病院（セキ病院）」，1953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派的東京華僑總會理事一職。[74]1960年11月，石藏江的東京華僑總會理事資格被該會剝除，[75]此後石藏江的政治思想從「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76]轉為尋求「台灣獨立」。

根據台青聯宣傳部門發行的雜誌《台湾》所述，石藏江從1966年5月起開始積極關注以下問題，一、如何向日本政府爭取對台籍因戰爭而傷殘者以及戰死者家屬的補償，二、如何改善從戰前便居住在日本的台灣人的居留問題。[77]1966年11月13日，石藏江擔任會長的「華僑文化協會」舉辦了「台灣人的權利要求講演會」。石藏江、台青聯的林啟旭、國會議員菊池義郎以及黃瑞來等人輪流上台演講，出席者約100名。[78]如上所述，同年

74「（五七）宏治0735 」（1968年2月13日），《偽台灣權利擁護總聯合會》，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5。〈新理事の顔ぶれ〉，《東京華僑会報》第13號，1953年5月15日，第1版。〈セキ病院〉，《華僑報》第85號，1957年12月1日。

75〈石藏江氏を「会員」から除名 二十一日の定例理事会で可決〉、〈石藏江会員除名に関する決議〉，《華僑報》第186號，1960年11月21日，第1版。

76 石藏江曾於1958年1月1日於《華僑報》上刊登一篇以〈周總理訪日的實現〉為題的評論，內文寫到：「早前在九段會館歡迎李德全訪日的派對上，見到五星紅旗為背板及以李德全衛生部長與王震農墾部長為中心，一字排開的祖國代表團場面十分壯觀，令人感到非常高興」。資料來源：石藏江，〈周総理の訪日実現へ〉，《華僑報》第87號，1958年1月1日，第1版。

77〈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 やっと交渉はじまる〉，《台湾》1：2，1967年2月，頁1。

78〈在日台湾人が法的地位を要求 華僑文化協会が声明〉，《月刊台湾協会報》第150號，1967年3月15日，第3版。

12月3日，石藏江與台青聯的廖春榮為了積極爭取日本其他地區台灣人的支持，參與神戶台灣同鄉會第四次親睦會，決定與神戶台灣同鄉會成員共同奮戰。

1965年6月日韓建交，隨著1966年1月17日「日韓法律地位協定」的正式生效，在日朝鮮人法律地位與生活保障方面皆獲改善。因此，戰前來日的台灣人，也開始積極向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及日本外務省請願。1967年1月17日，中華民國駐日大使張之邁拜訪日本外務省，要求進行有關「中華民國籍」在日台灣人及其子孫法律地位問題的交涉。[79]然而，石藏江及台青聯卻主張：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因此交涉有關在日台灣人法律地位時，日本政府應該直接與在日台灣人或其他代表進行。[80]除了戰前即居住在日本的台灣人有居留問題，旅日台獨運動者也有居留上的問題。[81]在這樣的情勢下，神戶台灣同鄉會、石藏江及部分台青聯成員携手舉辦許多活動。

同年1月20日，，石藏江召集華僑文化協會、台青聯、神戶台灣同鄉會等相關人士，如廖春榮、林啟旭及林朝偉等人，[82]以華僑文化協會名義發表「緊急聲明」，[83]石藏江更決定於2月5日召集日本六大都市（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的台灣人舉行代表會議。[84]

1967年2月5日，依據之前的共識，由石藏江等人成立「台灣人權利擁護總連合會」（以下稱台灣人總連合會），由石藏江、張春興、林炎星、林朝偉、楊逸舟（楊杏庭）、羅正修、廖春榮、侯榮邦、林啟旭、張國興、許世楷、陳天色、李宗元、廖學全等共計26名出席成立大會。台灣人總聯合會成立初期幹部如下：會長石藏江，副會長為李宗元，議長張

79 何義麟，〈戰後在日台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收錄於許雪姬編《來去台灣——台灣史論叢 移民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年），頁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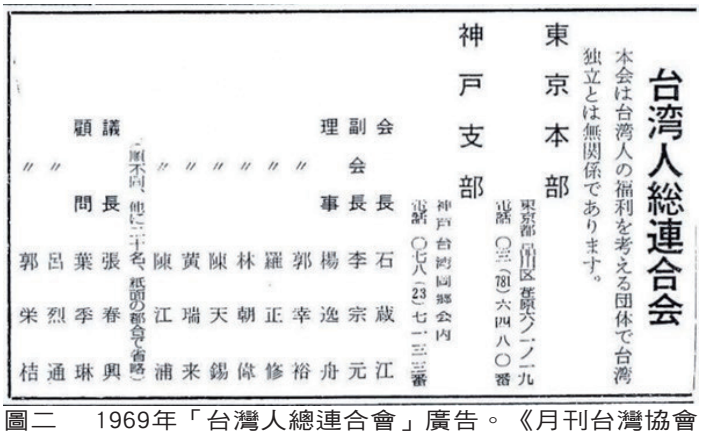
80 何義麟，〈戰後在日台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頁288。

81 葉亭葶，〈從柳文卿事件探討日本政府對台獨運動者居留政策之轉變過程——兼論對在日台獨運動的影響〉，頁244。

82「（五六）固基0690」（1967年2月4日），《偽台灣權利擁護總聯合會》，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5。

83〈在日台湾人が法的地位を要求 華僑文化協会が声明〉，《月刊台湾協会報》第150號。

84「（五六）固基0690」（1967年2月4日），《偽台灣權利擁護總聯合會》，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5。


台湾人総連合会

本会は台湾人の福利を考える団体で台湾独立とは無関係であります。

東京本部
東京都品川区荏原六ノ一ノ一九
電話 〇三(781)六四八〇番

神戸支部
神戸台湾同郷会内
電話 〇七八(23)七一三三番

会長 石蔵江
副会長 李宗元
理事 楊逸舟
〃 郭幸裕
〃 羅正修
〃 林朝偉
〃 陳天錫
〃 黄瑞来
〃 陳江浦
（順不同、他に二十名、紙面の都合で省略）
議長 張春興
顧問 葉季琳
〃 呂烈通
〃 郭栄桔

圖二　1969年「台灣人總連合會」廣告。《月刊台灣協會報》（東京），1969年9月15日，第180號。

春興，常任理事羅正修，理事楊逸舟、廖學全、黃銅山（神戶台灣同鄉會會長）、林水。[85]1967年4月8日，台灣人護總連合會在於東京品川區立青年會館舉行「台灣人的權利要求全國大會」，[86]出席者如次：會長石藏江、神戶台灣同鄉會的林朝偉、楊杏庭，台青聯的黃昭堂、廖春榮、林啟旭、張國興、柳文卿，作家邱永漢，以及台灣協會[87]理事長的田中泰作等110名，大會中決議向日本政府各相關單位提出「有關台灣人法律地位等請願書」[88]

從上述石藏江相關活動可以發現，林朝偉、楊逸舟（楊杏庭）、黃銅山等神戶台灣同鄉會成員，後來亦成為台灣人總連合會主要成員。又如，1968年5月，神戶台灣同鄉會成員吳瀛杰不幸去世，6月3日在神戶關

85「（五六）固基0690」（1967年2月4日），《偽台灣權利擁護總聯合會》，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5。

86 根據何義麟的研究，像「台灣人的權利要求全國大會」這樣的要求似乎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回應。1991年日本修改〈出入國管理法〉，並制定「根據對日本國和平條約規定在該條約最初生效日脫離日本國籍者等之出入國管理相關特例法」，戰前來日的台灣人相關的法律地位問題大致告一段落。何義麟，〈戰後在日台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頁288、292-293。

87 戰後「台灣協會」是在「台灣總督府殘務整理事務所」的斡旋下，以台灣引揚民會、舊台灣協會、台灣事業協會等團體為母體，於1950年9月成立。台灣協會相關人人士長期從事「台灣引揚者」（戰後從台灣返回日本的日本人）個人資產歸還運動等。現在台灣協會主要業務有：舉辦「台灣相關日本人已故者追悼法會」以及保存殖民統治資料等。關於戰後台灣協會，請參閱：鍾淑敏，〈戰後日本台灣協會的重建〉，收錄於許雪姬編《台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4年），頁69-121。

88「（五六）固基0690」（1967年2月4日），〈偽台灣權利擁護總聯合會〉，〈外交部檔案〉，006.3／0035。〈台湾人の権利要求 全国大会で決議〉，《月刊台湾協会報》第152號，1967年5月15日，第1版。〈台湾人の権利要求大会 日本政府に請願〉，《台湾》1：5，1967年5月，頁31-32。

帝廟舉行葬儀，臨時政府廖明耀、台青聯吳進義、台灣公會黃介一、神戶台灣同鄉會林朝偉、台灣人總連合會石藏江、台灣鄉友會黃新興（龍雄）皆前往參加。吳瀛杰何許人也？依據國家安全局記錄指出，[89]吳瀛杰乃兼任台灣人總連合會之「委員」。[90]

更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人總連合會不僅於在日台灣人權益擁護運動上扮演推手的角色，對於舉辦台灣人戰歿者慰靈儀式方面也盡心盡力。從1967年8月開始到1970年為止，台灣人總連合會與台灣協會一同在東京舉辦了四次「戰歿台灣人合同慰靈祭」。[91]1968年8月15日，在東京增上寺舉行了第二屆「戰歿台灣人合同慰靈祭」，參加者有田中泰作（台灣協會）、石藏江、郭幸裕、[92]郭榮桔、羅正修、葉季琳（以上、台灣人總連合會）、黃昭堂、廖春榮、林啓旭、侯榮邦、張榮魁、張國興（以上、台青聯）、黃瑞來（傷殘軍人會）、林朝偉（神戶台灣同鄉會）等人。[93]

圖二為「台灣人總連合會」廣告[94]。從這個廣告可看出該會的活動範圍已擴展到了神戶，且將神戶支部會址設在神戶台灣同鄉會內。[95]廣告中連合會在最初的介紹部分就表明了「本會是謀求台灣人福利的團體，

89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指示國民黨第六組、駐日大使館以及國家安全局的駐日人員一起在日本組成「地下情報活動聯繫網路」。請參閱：戴振豊，〈廖承志の対日工作と中華民国：LT貿易協定・廖承志訪日を中心に〉，收錄於王雪萍編，《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3），頁244。

90「國家安全局周中峯發函給外交部，（五七）宏治4831」（1968年7月5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3。

91〈友よ安らかに 在りし日の思いは千々に 八月十五日芝増上寺で戦没台湾人合同慰霊祭〉，《月刊台湾協会報》第155號，1967年8月15日，第2版。〈靖国神社で戦没台湾人合同慰霊祭〉，《月刊台湾協会報》第191號，1970年8月15日，第1版。〈戦没台湾人合同慰霊祭 在東京挙行〉，《台湾青年》第81號，1967年8月15日，頁28。

92 郭幸裕（1920-1990）。1920年，生於在台灣。1944年，以日本軍屬身份被日本政府派往海南島，日本戰敗後赴日。1950年代中期，在神戶籌組「駐日台灣解放籌備會神戶本部」，不久後參與「台灣獨立統一戰線」，於1961年宣佈脫離廖文毅的組織，另成立「台灣自由獨立黨」。1970年代初，其自行組織「台灣鄉友連合會」。資料來源：「光華出版社編印《廖文毅及其活動內幕》」（1962年2月），《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4。〈中村さん、日本人として迎えて！“小野田さんと同じだ”郷友総連冷たい厚生省に運動〉，《読売新聞》夕刊，1974年12月27日，第7版。

93「國家安全局周中峯發函給外交部，（五七）宏治4831」（1968年7月5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3。

94〈台灣人總連合會〉，《月刊台灣協會報》，1969年9月15日，第180號。

95「（五七）宏治0639」（民國56年2月7日），《偽台灣權利擁護總聯合會》，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5。

跟台灣獨立並無關係（本会は台湾人の福利を考える団体で台湾独立とは無関係であります）」，由此可見此會如何用「非政治」團體的名目來包裝自己。

而林朝偉、楊逸舟、呂烈通[96]皆為台灣人總連合會的幹部。根據國家安全局報告，台灣人總連合會在神奈川縣也設立「支部」，其中呂烈通被視為「親匪份子」。[97]這是因為呂烈通兼任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橫濱華僑聯誼會成員，而長期被中華民國政府列為黑名單，直到1980年自橫濱華僑總會退出，才實現返台探親。[98]

（二）神戶台灣同鄉會的弱化

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對神戶台灣同鄉會以及台灣人總連合會成員進行施壓後，當地台灣人對兩會的支持漸減。這不僅造成在神戶及東京舉辦的台灣人戰歿者追悼儀式大受影響，也導致上述兩會在1970年代初逐漸失去活力。[99]1972年9月，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台日斷交前，「神戶台灣同鄉會」成員多涉及政治，但台日斷交後漸漸走入歷史。幾乎同一時間，1973年1月徐燦生以「謀求會員間的和睦以及經濟發展」為宗旨，在神戶另外成立了「兵庫縣台灣同鄉會」。[100]兵

96 呂烈通（1915-不明）。1915年在台南出生，中學畢業後曾任牙科助理，在朝鮮的牙科診所工作。取得醫師執照後，在朝鮮開設牙科診所，直到戰爭快結束前才赴日。戰後在神戶生活，靠著販售糖精維生。1951年搬至神奈川縣川崎市，經營牙科診所。1965年5月擔任橫濱山手中華學校校舍建築委員會常務委員，也曾任橫濱華僑聯誼會（1976年改名為橫濱華僑總會）理事。《呂烈通先生の米寿まで》（出版社不詳，2002年），符順和女士所蔵（非賣品）。〈横浜、新校舎建設へ 民族教育の充実のため 全僑胞の支援を要望〉，《華僑報》第314號，1965年2月1日，第1版。

97「國家安全局周中峯發函給外交部，（五七）慎固2212」（1968年4月23日），《偽台獨黨活動》，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6.3／0033。

98〈旅日華僑呂烈通 棄暗投明訪故鄉 三十八年鄉愁隨淚化去 親人趕到花蓮設宴接風〉，《中央日報》，1980年4月29日，第3版。

99 1973年2月，石藏江就任「台灣共和國國民議會議長」。而後，在《台灣民報》上介紹石藏江時，不再出現「台灣人總連盟會長」之頭銜，轉為以「國民議會議長」稱之。資料來源：石藏江，〈台湾人自身が独立を妨害している 石藏江（台湾総連盟会長）〉，《台湾民報》第229号，1972年9月15日，第4版。石藏江，〈台湾人が台湾独立を妨害している 台湾共和国臨時議会議長石蔵江〉，《台湾民報》第246號，1974年3月15日，第3版。

100 陳瑞麟，〈兵庫県台湾同郷会開会の辞〉，《兵庫県台湾同郷会会報》創刊號，1973年9月1日，頁5-6。

庫縣台灣同鄉會部分幹部並不忌諱「華僑」一詞，[101]同時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僑團與支持中華民國僑團兩個系統對立的局面下，不表態其政治立場，也不迴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往來。[102]或許是這一潮流的反映，黃龍雄、林朝偉、楊逸舟等原神戶台灣同鄉會幹部，沒有在兵庫縣台灣同鄉會擔任任何職位。

值得深思的是，黃龍雄、楊逸舟以及台灣人總連合會會長石藏江反而參與了在台日斷交後於東京成立的「在日台灣同鄉會」。[103]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是原台灣人總連合會顧問郭榮桔，副會長是王育德。在日台灣同鄉會當時雖沒有明確主張其政治立場，但成員多為台獨人士。此外「在日台灣同鄉會」之會員雖不限於居住在東京的台灣人，但並沒有在其他縣市設立支部。在這一背景下，在日台灣獨立運動漸往東京發展，在神戶的台獨組織也就此消失。

此外，1975年2月28日王育德成立「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開始進行向日本政府陳情等活動。[104]雖然從結果來看，神戶台灣同鄉會及台灣人總連合會的活動最後徒勞無功，但整體而言，對於台籍日本兵的台灣人戰後處理等問題，他們在更早之前就已嘗試推行。

六、結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並喪失了對台灣及朝鮮等殖民地的統治權，台灣自此由中華民國接收。然而不少殖民時期移居日本的台灣人及朝鮮人還持續留在日本，1952年4月的《舊金山和約》使他們喪失了日本國籍，也使得居住於日本的「舊殖民地出生者」失去保障，法律地位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101 徐元隆，〈会報の創刊に寄せて〉，《兵庫県台湾同郷会会報》創刊號，1973年9月1日，頁11。
102 北京日本歸僑聯誼會編《日本歸僑華僑與中日友好——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北京：北京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2012），頁201。
103〈台湾同郷会理事会役員〉，《在日台湾同郷会報》創刊號，1973年5月1日，第1版。
104 王育德過世後兩年的1987年12月28日，日本政府確定：「台灣人原日本兵戰死者、戰重傷者，每人支付200萬日圓。」詳細請參閱：何義麟、蔡錦堂《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台北：新台灣和平基金會，2019），頁232-235。

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台灣，則於1947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起因於國民黨的施政不當，因此引起在日台灣人的反感。接著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令，對台灣人的控制日益嚴密，島內的異議人士難以生存，只好向海外發展。例如廖文毅所領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等台獨組織，多在1945年至1950年代中期所成立。

進入1960年代，面對廖文毅返台、日韓建交等國際環境的變化，在日台灣人深感需要爭取自身的權益，一部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派」與「台獨派」攜手合作，成立了在日台灣人的新團體。

1960年代，戰後日本政府所忽略的議題開始受到矚目。1960年3月20日，一位日本人在京都靈山觀音為被處死刑的台灣戰犯舉辦追悼儀式，從事台獨運動的黃介一也參加了這個追悼會。隔年3月，廖文毅在京都靈山觀音主持了「大東亜戰爭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出席者包括黃介一與黃龍雄。至1965年9月，黃龍雄在神戶自行組成「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提倡籌建慰靈塔，並於11月27日在神戶舉辦了「慰靈祭」。

「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成立後，同年6月因日韓建交而解決了在日朝鮮人的法律地位問題。這使得戰前就來日本的台灣人以及戰後來日從事台獨運動人士，迫切希望解決自身的居留問題。在這樣的情勢下，神戶台灣同鄉會於神戶正式成立，他們以「無黨、無派、無政治思想」的「三無主義」為基礎，並以改善在日居留問題為訴求，向日本政府陳情。在此之前，「台灣人戰歿者合同慰靈祭典實行委員會」也與神戶台灣同鄉會同樣標榜「非政治」等無政治色彩，盡量避免讓自身處在國民黨的管理範疇之內。然而，兩會幹部多半屬廖文毅一派，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仍然認定其為「台獨份子」，並認為這些都只是假藉名義，實際上仍是為推動台獨活動而存在的組織。

1967年2月，為了解決在日台灣人的法律地位問題，石藏江於東京成立了「台灣人權利擁護總連合會」，此會會員也包括神戶台灣同鄉會的成員。然而這兩個組織雖然都標榜無政治色彩，但由於兩會領導者的政治傾向非常明顯，使其所提出之「非政治」的策略不僅徒勞無功，更導致這些組織於1970年代初黯然解散、消失。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一）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

（二）報紙、會報、雜誌

《中央日報》（台北）
《月刊台湾協会報》（東京：台灣協會）
《台湾》（東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廣報部）
《台湾公論》（神戸：台灣公論社）
《台湾民報》（東京：台灣民報社）
《台湾青年》（東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
《在日台湾同郷会報》（東京：在日台灣同鄉會）
《自由新聞》（東京：自由新聞社）
《兵庫縣台灣同鄉會會報》（神戸：兵庫縣台灣同鄉會）
《東京華僑会報》（東京華僑總會）
《華僑報》（東京華僑總會）
《読売新聞》（東京）

二、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

（一）中文

北京日本歸僑聯誼會編
2012《日本歸僑華僑與中日友好——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北京：北京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
史明
2016《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台北：前衛出版社。
何義麟
2015《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2019 〈戰後在日台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收錄於許雪姬編《來去台灣——台灣史論叢 移民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頁273-296。

何義麟、蔡錦堂

2019 《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台北：玉山社。

李世傑

1988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

岡野翔太

2018 〈去殖民化中在日台灣人身份定位的再建構——以日本神戶「台灣省民會」（1945-1946）為例〉，《台灣史學雜誌》24，頁38-75。

張炎憲、陳美蓉主編

2012 《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許瓊丰

2011 〈戰後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廖文毅及其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為中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陳來幸；許瓊丰譯

2013 〈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重建與結構變化——台灣人的擡頭與錯綜複雜的東亞政治歸屬意識〉，《台灣風物》63，頁135-162。

陳昱齊

2015 《中華民國政府對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之因應：以美國為中心（1956-1972）》。台北：國史館。

陳慶立

2014 《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

黃昭堂口述；張炎憲、陳美蓉採訪整理

2012 《建國舵手黃昭堂》。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楊逸舟（杏庭）遺稿、張良澤譯

1990 《受難者》。台北：前衛出版社。

葉亭葶

2016 〈從柳文卿事件探討日本政府對台獨運動者居留政策之轉變過程——兼論對在日台獨運動的影響〉，收錄於陳君愷主編《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台灣歷史學會創立2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歷史學會，頁239-275。

歐素瑛、林正慧、黃翔瑜訪問記錄

2014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台北：國史館。

鍾淑敏

2014 〈戰後日本台灣協會的重建〉，收錄於許雪姬編《台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頁69-121。

（二）日文

小野純子

2014 〈太平洋戰争期、台湾人徴集兵における戦争体験〉，《人間文化研究》巻22（2014年），頁66-67。

天江喜久

2018 〈台南の「救世主」となった「日本人」——湯徳章英雄説の検証と分析〉，《日本台湾学会報》20，頁126-147。

王育徳著；近藤明理編集協力

2011 《「昭和」を生きた台湾青年 ： 日本に亡命した台湾独立運動者の回想1924→1949》。東京、草思社。

不著撰者

2002 《呂烈通先生の米寿まで》，不著出版社。

中華會館編

2013 《落地生根——神阪中華会館の百年 改訂版》。東京：研文

出版。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逓信部

1935 《台灣の海運》。台北：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逓信部。

安井三吉

2018 〈神戸華僑聯誼会史綱（1957-1976）〉，收錄於戦後神戸華僑関係資料を読む会編，《戦後神戸華僑史の研究》。神戸：神戸華僑歴史博物館，頁27-99。

赤澤史朗

2014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戦沒者の「慰霊」と追悼〉，《立命館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82，頁117-133。

何義麟

2014 〈戦後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の変遷——永住権取得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現代台湾研究》45，頁1-17。

松井明太

1993 〈神戸と台湾出身華僑〉，甲南大學綜合研究所編，《神戸と華僑》。神戸：甲南大学綜合研究所），頁51-72。

神阪京華僑口述記録研究會

2010 《聞き書き・関西華僑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3。神戸：神戸華僑歴史博物館。

郭鋭

2018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独立運動に関する研究〉，神戸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許瓊丰

2009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課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兵庫縣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博士論文。

陳來幸

2016 〈在日台湾人と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左傾化現

象〉，收錄於陳來幸・北波道子・岡野翔太編，《交錯する台湾認識——見え隠れする「国家」と「人びと」》。東京：勉誠出版、2016年，頁165-180。

張有忠

1989 《私の愛する台湾と中国と日本》。東京：勁草書房，1989年。

遠藤正敬

2013 《戸籍と国籍の近現代史——民族・血統・日本人》。東京：明石書店。

橘尚彥

2011 〈京都忠霊塔と霊山観音——東山・霊山山麓における戦死者祭祀をめぐって〉，《京都民俗》28（京都），頁149-171。

戴振豊

2013 〈廖承志の対日工作と中華民国：LT貿易協定・廖承志訪日を中心に〉，收錄於王雪萍編，《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頁237-261。

Decolonializing Kobe Taiwanese Association in Japan in 1960's: between Depoliticiz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Okano Shota (YEH, Hsiang-Tai)*

The right of adobe of Taiwanese in Japan, the compensation to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an, as well as the tribute to the deceased were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overlooked in post-war East Asian order, neglected by both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60s, Kobe Taiwanese Association attempted to set apart from the control of "Two Chinas". By taking non-political approach, Kobe Taiwanese Association, representing Taiwanese in Japan, had a voice in the war compensation and right of adobe of Taiwanese after WWII.

Kobe Taiwanese Association was found with the principle of "No party, no wings and no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order to plea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aiwanese's right of abode with Japanese government. However, key members of the Kobe Taiwanese Association were took part in Thomas Liao's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iwan".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ey were therefore regarded as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on the pretext of pro-independence faking its political neutrality. Despite their non-political claim, Kobe Taiwanese Association was smeared for its alleged political affiliation based on the speculation over the member composition. The effort made by the association was therefore in vain. The association later dissolved in 1970s under the pressure of ROC.

Keywords：Taiwanese in Japan、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an、Decolonization、Kobe Taiwanese Association、Overseas Chinese

* Specially Appointed Researcher, Graduate School of Language of Culture, Osaka University.